

## 重寫蘇聯史：俄國學者的新觀點 (1991-2003)

### 一、前言

在蘇聯時代，歷史書寫被高度政治化，絕大多數的歷史著作都是為當下權威提供統治的正當性。國家機器掌控「集體記憶」，經常扭曲或捏造過去所發生的事件。1991年8月，蘇聯發生政變，蘇聯共產黨的統治正式走入歷史。隨之而來的大量檔案開放，對歷史學界影響之大，有所謂檔案革命之說。<sup>1</sup>同時，過去官方以馬列主義主宰歷史詮釋的現象亦隨之解除，雖然這並不表示每個俄國歷史學者的個人意識形態束縛亦隨之消失。由於政治的鬆綁，過去視為禁忌的議題或人物，以及過去不可能出版的日記、回憶錄等資料相繼問世，使得許多俄國學者得以利用新的材料，試圖採用新的角度，重新審視與撰寫他們過去的歷史（或稱為祖國史）。同樣地，俄國以外地區的學者，也因為蘇聯解體後的一連串變化，有機會從檔案或口述歷史去印證或修正他們過去所提出的論點，並且也增加了與俄國學者互動和學術交流。

本文之目的是，檢視蘇聯解體後，一些比較能夠放開馬列主義束縛的俄國學者如何重新書寫蘇聯史（或稱俄國現代史）？他們的著作反映出什麼特色與動向？本文所用的資料是已出版的俄文專書，因為專書較能有系統且清晰地闡釋新的觀點。為使讀者對於能夠較為清楚地了解蘇聯解體後歷史書寫的發展，必須對蘇聯解體前的歷史書寫有些基本的認識，否則無從明白其演變的來龍去脈。因此本文第二節的內容即是對十月革命後至八月政變期間的蘇聯史寫作一鳥瞰式回顧。第三節則分別以十月革命、史達林的統治、冷戰時期的歷史為焦點，介紹與分析俄國學者的最新研究。必須聲明的是，本文所提及的專書以能夠呈現不同於馬克斯史觀的新解釋為主。其次，本文之取材不可能完全避免筆者個人的偏好，蒐羅的材料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遺珠之憾勢所必有。

### 二、蘇聯解體前歷史書寫的回顧 (1917-1991)

蘇聯史學的奠基者是波克羅夫斯基(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1868 -1932)。<sup>2</sup>他是第

<sup>1</sup> 俄國各檔案館的收藏與更名，見余敏玲，〈俄國主要檔案館現況簡介〉《近代中國》，期 140（民國 89 年 12 月），頁 200-217。各檔案館最新狀況與開放時間見 <http://www.iisg.nl/~abb/>。Donald J. Raleigh, "Doing Soviet History: The Impact of the Archival Revolution" *Russian Review* 61 (Jan. 2002): 16-24.

<sup>2</sup> 波克羅夫斯基在 1891 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歷史系，1905 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1917 年在莫斯科參加反對沙皇的武裝勢力。十月革命後他成立馬克斯歷史學家學會，曾任紅色教授學院院長，共產主義學院主席團主席。十月革命之前，他企圖以馬克斯觀點有系統地敘述過去，在芬蘭完成了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俄國史：上古至商業資本主義的興起）5 卷，（Москва：1913-1914）。革命之後，他又寫了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俄國文化史概要）2 卷，（Петроград：1923，第 5 版）。這本書主要挑戰當時有名的文化史家米留可夫(П. Н. Миллюков)，*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части I-III*（俄國文化史概要）三卷，（Москва：Прогресс-Культура，1993-1995 重印）的方法論。米留可夫強調人口的自然成長，國家的軍事與財政政策是形成俄國階級社會的關鍵因素。波克羅夫斯基則認為經濟發展最重要，只有採取唯物觀點，才能真正解釋俄國文化史的發展。

一位運用唯物史觀撰寫歷史的俄國學者。十月革命之後，波克羅夫斯基有感於當時流行通用的教科書都是「舊資產階級學派」史家，如普拉托諾夫(С. Ф. Платонов, 1860-1933)、克柳切夫斯基(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1841-1911)、索洛維夫(С. М. Соловьев, 1820- 1879)之作，因此撰寫了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самом сжатом очерке* (俄國簡史)。這是他依據 1919 年在斯維德洛夫(Свердлов)共產主義大學講演而寫成的專書。他的歷史分期不是以過去流行的政治事件為標準，而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他認為階級鬥爭才是決定俄國國家與社會成長的關鍵，惟有基於階級鬥爭的原則才是科學的史學。他運用唯物史觀(按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指出從基輔羅斯到十九世紀下半的工人運動是一系列的階級鬥爭史。該書譴責沙皇專制的侵略本質及其對境內少數民族的暴行與壓迫；同時也批判舊俄資產階級史學。<sup>3</sup>列寧特別讚賞該書，視其為當時蘇聯歷史教科書的最佳範本。<sup>4</sup>從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初期，波克羅夫斯基學派主宰蘇聯史學界。

1930 年代初期，蘇聯當局又開始慢慢重視資產階級史學家。個中原因是史達林認為過去以馬克斯觀點撰寫的教科書太過冗長與混亂，充滿關於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抽象定義，缺乏歷史事件的人名、日期，沒有按照年代清楚地敘述歷史重要事件的因果關係。他要史家以傳統的敘事方式來凸顯馬克斯主義史觀。<sup>5</sup>1930 年代中期，史達林的政權已經穩固，對其個人崇拜日盛，加上納粹德國的威脅日增，有關當局刻意培養蘇聯愛國主義，以對抗納粹德國的反共。這使得波克羅夫斯基蔑視的民族主義觀點因而遭到嚴厲批判。在波克羅夫斯基眼中，民族主義乃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產物，一點都不值得頌揚。(事實上，1923 年，人民教育委員會曾經頒令禁止歷史教學歌頌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同時，他所撰寫的歷史主角是一般平民百姓，而不是領袖。這些都不是史達林所能容忍的。因此，即使波克羅夫斯基已於 1932 年過世。他所代表的史觀與學派從 1934 起備受批判。1939 年，掌管黨意識形態宣傳的主要人物雅羅斯拉夫斯基(Е. Ярославский)正式宣告這個學派的死亡。他在《真理報》刊登一文，指責所謂「波克羅夫斯基學派」嚴重歪曲與醜化馬克斯學說。<sup>6</sup>此後，連波克羅夫斯基的學生也加入譴責其師的

<sup>3</sup> 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самом сжатом очерке* (Москва: Партий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2, 第二版)。

<sup>4</sup> 同上，無頁碼。十月革命之後，蘇共高層領導對於歷史教學的看法與爭論，詳見 Т. Ю. Красовиц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ежду реформаторством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аризмом. Февраль 1917-1920 год* (介於改革派與革命派之間的俄羅斯教育，1917 年 2 月—1920 年)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2) сс. 325-379。

<sup>5</sup> "На фронт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在歷史科學的戰線上) *Директивы ВКП (б) 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 народн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и, 1917-1947 гг.* (聯共(布)的指示與蘇維埃政府關於人民教育的命令，1917-1947)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СФСР, 1947) том 2, с.182; И. Сталин, "Замечания по поводу конспекта учебника по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關於蘇聯史教科書綱要的意見), сс. 37-40; "Замечания о конспекте учебника *Новой истории*" (關於近代史教科書綱要的意見), сс. 41-45 *Сочинения* (史達林選集), I (XIV) ed. by Robert H. McNeal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67)。

<sup>6</sup> Е.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Антимарксистские извращения и вульгаризаторств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школы» Покровского" (反馬克斯主義的歪曲和庸俗化的所謂波克羅夫斯基「學派」), *Правда* (真理報), 1939 年 1 月 12 日，版 3。

隊伍，嚴厲批評他採用資產階級方法學，歪曲蘇聯內戰的歷史，反對列寧主義。

史達林爲了完全壟斷過去的集體記憶，進一步統一與純化全國思想，欽定了新的黨史：*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В. К. П.* (6) (聯共黨史簡明教程)。該書名義上是俄共中央委員會授權，其實主要捉刀者是雅羅斯拉夫斯基，史達林則親自參與編輯與審核。1938年該書問世之後，蘇共政治局決議發行600萬冊，作爲訓練黨的幹部之用，並翻譯成蘇聯境內各共和國、各民族的文字與外國語，俾便廣爲宣傳書中理念。<sup>7</sup>這本黨史取代了蘇聯所有的教科書。此後蘇聯的歷史書寫完全爲黨的機器所掌控。

《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主旨在說明從1917年之前到十月革命、內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史達林一直都與列寧並肩作戰，爲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理想而奮鬥。他是列寧最忠實的助手與接班人。該書特別強調黨內路線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並突顯史達林在這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同時，該書也刻意貶抑與醜化其他黨國元老，指控他們在十月革命之前即有反革命的傾向或陰謀；史達林在1920年代的所有政敵，在1917年之前便已形成所謂的「托洛斯基派」。高瞻遠矚的史達林，從一開始便積極地與他們從事勢不兩立的鬥爭。這些無非是爲史達林在1920-1930年代殘酷地逮捕與槍決他的政敵提供歷史合法性的基礎。該書序論中特別提到閱讀本書不但可以協助讀者掌握布爾什維克主義，還可以加強政治警覺性。此後，所有的蘇聯史書寫都不能超出本書的意識形態框架：不能寫托洛斯基是紅軍創始人，不能寫布哈林是黨內傑出的理論家，不能寫史達林在1917年曾經反對過列寧（如簽訂對德和約等）；必須寫史達林是眾望所歸的領袖，必須將所有榮耀全放在他的光環之下。這本教科書的出現代表了蘇聯政治干涉歷史書寫的最高點。本書可視爲史達林主義的聖經，但也使得歷史完全淪爲政治鬥爭的工具。史達林用《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統一思想，整肅異己。後來的毛澤東在延安實行整風，也是運用此書達到同樣目的。

1956年2月，蘇共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當天晚上，赫魯雪夫發表了震驚全世界的「秘密報告」，譴責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其後開啓了蘇聯學術與文化界的短暫解凍序幕。年輕的共產黨員，亦是當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歷史問題) 的副總編布爾德扎洛夫 (E. H. Бурджалов)，發表文章重新評估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在1917年革命扮演的角色。他公開證明所有被史達林整肅的黨國元老，也就是《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中被指稱是反列寧主義的這些領袖，在革命期間均與列寧關係良好。結果這篇文章受到強烈的批評，布爾德扎洛夫被解除職務，改任閒職。<sup>8</sup>這也意味著當時貶抑史達林還是有很大的限制，同時蘇聯主政

<sup>7</sup> 全名爲 *История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Госу.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38)；"И. В. Сталин в работе над «Кратким курсом истории В. К. П.(6)»" (史達林與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歷史問題), 2003 № 4, сс. 3-4.

<sup>8</sup> Э. Н. Бурджалов, "О тактике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марте-апреле 1917 года" (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3-4月的策略)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4, 1956, сс. 38-56. 不過，布爾德扎洛夫後來還是出版了一本關於1917年二至三月革命的重要著作：*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осстание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第二個俄國革命：彼得格勒的起義)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7)。二十年後方出現英譯本：*Russia's*

者也還無法完全接受為這些黨國元老翻案。1961年10月，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進一步批評史達林，史學界也推波助瀾更為嚴厲地批評史達林在過去許多政策上所扮演的負面角色。其中最引入注目的焦點之一是，農業集體化與1929-1930年的反富農路線問題。其時任職於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丹尼洛夫(Виктор П. Данилов)率領所內一群學者研究1920年代的農業，並強烈批評1929年政治局的決策。他們認為1929年4月蘇共十六大原本決定採取溫和步伐實行集體化是對的，但是政治局卻突然在11月決定加快步伐並剷除富農；而史達林是這個決策的罪魁禍首。<sup>9</sup>

1964年10月赫魯雪夫突然下台，蘇共政治局決議不再繼續批評史達林。這使得丹尼洛夫及其團隊即將出版的書稿(已經完成校對)，立即遭到出版社的退稿。這份書稿極力譴責史達林強迫集體化的政策，特別是他使用的暴力手段所造成的農村悲劇。根據他們的研究，當時蘇聯農村以貧農與中農占大多數，根本還沒準備好大規模集體化的基礎。該書尚未問世之際，在黨的刊物 *Коммунист* (共產黨人) 上，卻已出現對丹尼洛夫(雖未指名道姓)論點強烈批評的文章。結果所有參與編書的人都被降職或調職。<sup>10</sup>不過，丹尼洛夫個人撰述的關於集體化以前的蘇聯農民的專書，仍在1977年和1979年分別出版。丹尼洛夫在書中敘述史達林的強迫集體化違反列寧主義農業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在19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上表現得很清楚。雖然丹尼洛夫相信俄國農業的長遠之計還是須要走向集體化，但是史達林式的集體化只是製造更多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sup>11</sup>

布里茲涅夫掌權之後，任命他從前的助理特拉佩資尼可夫(С. П. Трапезников)主管蘇共中央委員會科學與教育處。特拉佩資尼可夫是個保守的史家，他長達十五年之久的任期對史學界的衝擊很大。不過，在布里茲涅夫主政期間，史學研究也並非完全停滯，還是向前邁出了一小步。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之交，有一

*Second Revolution: The February 1917 Uprising in Petrogra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sup>9</sup> 農民出身的丹尼洛夫，畢生致力於研究蘇聯農業。蘇共二十大之後，他出版了 *Создание материаль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предосылок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СССР* (建立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物質與機械的先決條件) (Москва: АН СССР, 1957)，該書挑戰自1929年以來官方史學對蘇聯農業的定論，亦即在1930之前，蘇聯農村並不具備實行農業集體化的機械與技術條件。Виктор П. Данилов, "К итогам изучения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и колхоз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 (研究蘇聯農民與集體農場建設歷史的總結)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60, № 8, сс. 34-64.

<sup>10</sup> 這份書稿名為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колхоз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 СССР: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СССР, 1922-1932* (蘇聯集體化與集體農場的建設：蘇聯農業集體化1922-1932) (Москва, 1964)。原來預定寫到1937年。反對觀點見 Ф. М. Ваганов,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農村經濟的轉變) *Коммунист* 1966, №3, с. 92-101。有關這份書稿寫成的來龍去脈與批評，詳見 Roger Markwick, *Rewriting History in Soviet Russia: the Politics of Revisionist Historiography, 1956-1974* (Palgrave, 2001) pp. 124-126.

<sup>11</sup> *Советская доколхозная деревня: население, земле-пользование, хозяйство* (集體化以前的蘇聯農村：人口、土地利用、經濟)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7)；*Советская доколхозная деревня: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оци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集體化以前的蘇聯農村：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9)。其中部份譯成英文：*Rural Russia under the New Regime*, trans. Orlando Fig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群所謂「新方向」的史家，他們雖然無法直接觸及執政者十分敏感的政治議題（如十月革命的正統詮釋，史達林的政策等），卻試圖從經濟議題著手來挑戰主流論述。他們積極探討革命前國家在俄國工業化、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他們認為過去官方史學宣稱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俄國經濟處於半殖民地狀態，並不符實。事實上，外資投入俄國經濟，促進了俄國在工業、交通、信用銀行的發展，形成俄國較高程度的資本主義化。因此，俄國經濟與西方資本的關係是夥伴關係，而不是外資壟斷與獨佔。這等於是肯定外資對俄國經濟發展的貢獻。但是外資也使得沙皇的專制政權更為鞏固，導致俄國不能成熟地在社會與政治領域轉型成功，使國家陷入沒有出路的改良主義。換言之，外資在俄國角色的問題，不是只有一個標準答案，不能將其過度簡化，作單一定位。<sup>12</sup>「新方向」史家的努力為日後重新審視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經濟與社會的本質研究奠下基礎。

戈巴契夫上台後提出了「新思維」治國方針，主要是改革與開放。人民開始對俄國史，特別是蘇聯史抱有史無前例的興趣。老百姓之所以關切蘇聯史寫作主要與他們過去的切身經驗有關。他們想瞭解過去那些慘痛的歷史經驗之根源為何？這些事件如何累積而導致當下蘇聯社會的危機？<sup>13</sup>即使在當時馬克斯主義仍是無法動搖的意識形態基礎，但是國內言論尺度比起從前寬鬆許多。1987年，適值十月革命七十週年紀念，在奧德薩舉行的以十月革命為主題的會議。雖然會議論文仍是依循舊章，這卻也是第一次邀請西方學者參加的會議，意義非凡。<sup>14</sup>

在戈巴契夫任內後期，史學界已經開始重新檢視十月革命是否為必須、而且是無可避免的道路？從二月革命過渡到十月革命的原因是什麼？學者們逐漸揚棄過去官方史學認定的十月革命是歷史必然發展的單一論調，開始認真討論十月革命的本質。<sup>15</sup>同時，有些學者開始為文抨擊列寧主義。1988年，契帕可（Александр Ципко）寫了四篇文章，刊登在 *Наука и жизнь*（科學與生活），追溯史達林主義的源頭。其目的是要打破過去學界的常有的另一種論點，即蘇聯實行的史達林主義是列寧主義的突變，史達林主義與列寧、列寧主義沒有直接關係。史達林是個壞蛋，列寧卻是好人。契帕可的文章卻指明了史達林主義其實根源於馬列主義。史達林主義可在馬列學說中找到依據，在十月革命和內戰均有其實際運用的例子。內戰時期所形成的蘇維埃政治制度，如果沒有作根本的改變，是無法防止史達林主義的發生。赫魯雪夫因為不能面對根深蒂固的史達林主義，導致他的改革失敗。因此契帕可寄望戈巴契夫，認為是打破革命的烏托邦目標的時候

<sup>12</sup> В. Б. Шепелева,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Ново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新方向」史學的命運) *Мир историка XX век* (20世紀史學家的世界), А. Н. Сахаров 編, (Москва: Инст. Росс.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2), сс. 219-257。

<sup>13</sup> P. V. Volobuev, "Perestroika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Soviet Historiography" *Russian Review*, vol. 15, Oct. 1992, p.566; Vladimir I. Shishki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Perestroika*: A Critical Analysis of Recent Soviet Historiography"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 22 (1992), p.517.

<sup>14</sup> Vladimir P. Buldakov, "The October Revolution: Seventy-Five Years On"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 22 (1992), p.497.

<sup>15</sup> Vladimir I. Shishki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Perestroika*: A Critical Analysis of Recent Soviet Historiography"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 22 (1992), p.519, 534.

了。

隨著戈巴契夫的開放政策，列寧和史達林過去光輝完美的形象，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污點，漸漸黯淡下來。1989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終於在蘇聯出版。他的書證明了集中營（在內戰時期建立的機構）的精神和運用可溯至列寧時期。同年，作家格羅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的書 *Все течет*（不斷流動），亦論及史達林主義根源於列寧主義，但他認為這是因為俄國歷史傳統和農奴心態，造成列寧和史達林專制的勝利。<sup>16</sup>此外，戈巴契夫為了強化他改革政策的合法性，並為他的改革政策辯護，他在任內後期，特別允許伏爾可葛諾夫(Дмитрий Волкогонов)將軍利用當時尚未對外開放的特殊檔案撰書，<sup>17</sup>其用意自然在貶低列寧與史達林的歷史地位，歌頌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為其平反。伏爾可葛諾夫的作品並非十分嚴謹的學術著作，但他的將軍身份，使他可以看到許多當時尚未對外開放的特殊資料，他的作品在一般讀者與專家之中十分流行。

從蘇共二十大之後到戈巴契夫下台之前，雖然書寫蘇聯史仍然無法完全脫離《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的架構與意識形態，卻已經有若干學者逐漸挑戰該書的論點，反對黑白分明，過度簡化的歷史解釋。這些都為蘇聯解體後的歷史書寫作了很好的鋪路工作。1991年8月蘇聯發生政變，蘇聯共產黨被禁止活動，其黨產亦被收歸國有，加諸於史學界的最後一個政治緊箍咒從此解除。

### 三、蘇聯解體後歷史書寫的回顧（1991-2003）

蘇聯剛剛解體之際，歷史的詮釋權不在史家手中，而在記者與政客手中。報紙常連篇累牘地出版所謂「秘辛」，政客也以操弄歷史詮釋來達到其特殊的政治目的。歷史學者則多半勤奮地埋首於新近開放的檔案館，爬梳史料。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關於蘇聯史的修正觀點的著作，大量問世。限於篇幅，也為敘述方便，現將蘇聯史依三個重要議題，按時間先後敘述。

#### （一）十月革命

這裡所稱的十月革命，指的是廣義的十月革命，不但包括革命前各政治黨派的活動、沙皇政權的被推翻、臨時政府的成立與解散、布爾什維克黨的奪權、國民大會的召開與解散，還包括內戰時期的活動等。一般而言，對於十月革命的負面評價居多，甚至可以說鐘擺從過去的親布爾什維克黨走向反布爾什維克黨的另一極端。<sup>18</sup>布爾什維克黨變成眾惡之首、恐怖份子，其他黨派則變成英雄、俄國

<sup>16</sup> R. W. Davies, *Soviet History in the Yeltsin Era* (New York: MacMillian Press, 1997) pp. 7-10.

<sup>17</sup> Дмитрий Волкогонов, *Триумф и трагед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И. В. Сталина* (勝利與悲劇：史達林的政治肖像)，(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гентства печати новости, 1989); *Троц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托洛斯基的政治肖像，兩卷)，(Москва: Новости, 1992); Лен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列寧的政治肖像，兩卷)，(Москва: Новости, 1994)

<sup>18</sup> V. P. Buldakov, "Scholarly Passions around the Myth of 'Great October': Results of the Past Decade" *Kritika*, Spring 2001, 2(2): 295-305

的救星。學者紛紛從研究右派（保守派）運動<sup>19</sup>、社會革命黨<sup>20</sup>、孟什維克派<sup>21</sup>、革命前的改革等，試圖尋求革命之外的可能選擇。在大量的反共與反革命著作中，最熱門的主角莫過於沙皇時代的最後一位改革者斯托里賓(Петр Столыпин, 1862- 1911)。從 1991 至 2003 年，俄國出版關於他的資料集、論文集、專著至少有四十種之多。相比之下，關於列寧的研究則是一本也沒有，可見俄國學者告別革命之心切。

在這些尋找革命以外選項的專書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著作是波塔索夫(Лев Г. Протасов)關於國民大會的研究。<sup>22</sup>1917 年 2 月尼古拉二世宣佈退位，臨時政府成立，成爲一過渡時期的政權，直到國民大會召開爲止。10 月 25 日（舊俄歷）布爾什維克黨以儘速召開國民大會爲由，推翻臨時政府。1918 年 1 月 6 日國民大會開幕，一天之後旋即爲擁有武力的布爾什維克黨強行解散。過去史學界沒人重視這個如此短命的國民大會，不認爲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有任何特殊影響力。波塔索夫則提出問題：爲何具有合法性的國民大會，如此無助地被篡權，特別是當時布黨實力不強？是否爲人民普遍承認的國民大會，其權力可以實現迫切且期待已久的改革，而能避免內戰的爆發？國民大會是否可能爲革命的結果帶來民主的機會？波塔索夫從十九世紀俄國知識界就有國民大會的觀念談起，到各界對國民大會的期望及其演變、選舉法的產生、各地的投票結果，來分析與解釋國民大會的歷史意義。作者特別強調這次投票全民的參與率很高，是俄國有史以來最自由與民主的選舉與大會，它的短命與失敗並不意味著俄國從此只能宿命地接受極權統治。作者將國民大會放在俄國過去的政治傳統與當前俄國的政治發展的大脈

<sup>19</sup> В. Ю. Рылов, *Прав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Воронеж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1903-1917* (在沃羅涅日省的右派運動, 1903-1917) (Воронеж: Изд-во Воронежского гос.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2) 轉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近現代史), 2004 № 1, сс. 185-187. 本書雖是沃羅涅日省的區域研究，作者意圖以此案例說明右派組織並不像過去所說得那樣保守反動。他們的觀點其實是斯托里賓改革的基礎。過去認爲右派組織與世紀之交各地出現的反猶屠殺，與嚴肅的右派組織無關，至少在沃羅涅日省是如此。不過，誠如該書的評論者(Я. А. Бутаков & А. В. Репников)所言，事實上，許多右派人士極力反對斯托里賓的改革，特別是解散公社。

<sup>20</sup> 社會革命黨在 1901 年底，由不同的民粹派組成，認爲俄國的未來在農民和土地社會主義化。史家開始注意社革黨在農村的組織、數量（比蘇聯官方的估計高很多），黨內的矛盾與派別，恐怖行動及社會各階層對其看法，1917 社革黨是跟著孟什維克黨走。1991 以後的研究，對社會革命黨的評價是新舊觀點並存，但以同情反對布黨佔多數，比較極端的看法是將社革黨的失敗全部歸咎於黨內左派與布爾什維克黨。有學者認爲社革黨在 1917 年以保存民主的方式，比起其他黨派更有可能將俄國走出危機(Кононенко 則認爲在當時情況下，沒有任何一個黨可以用保留民主的，解救俄國。關於社會革命黨最新的史學研究回顧，詳見 А. А. Кононенк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社會革命黨的當代俄國史學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 4, сс. 112-120.

<sup>21</sup> 馬克斯主義者在 1898 年成立俄國社會民主工人黨，1903 年分裂成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派。關於孟什維克最好的著作是 С. В. Тютюкин, *Меньшевизм: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孟什維克主義史)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丘錄今的專著，可說是目前研究孟什維克主義論點較爲持平者。他沒有一味將孟什維克派理想化，也沒有走向完全反對布爾什維克派的另一極端；而能夠較爲冷靜與客觀地比較兩派領袖的人格特質與當時內外情勢所帶來的限制。再者，該書也是目前僅見研究孟什維克派能夠運用存放俄國之外的檔案與資料。

<sup>22</sup> Лев Г. Протасов,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全俄國民大會：誕生與滅亡史)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7) 轉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 5, сс.206-208.

絡來談，頗具啓發性。

與波塔索夫的焦點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布達可夫(Владимир Булдаков)用暴力角度來解釋十月革命的專書。在當今研究十月革命的所有著作中，最引人注目與受人爭議的莫過於布達可夫的 *Красная смута: Природа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шo насилия* (紅色的混亂：革命暴力的本質與後果)。<sup>23</sup> смута (混亂)一詞來自十七世紀初俄國的混亂時代。在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之前，因沒有可以遵循的王位繼承制，導致當時的大貴族和外戚專權的現象，繼而引來鄰國波蘭的入侵與冒牌沙皇的統治，使得國家處於近十五年的混亂狀態。布達可夫用紅色混亂一詞，顯然指涉 1917 年，羅曼諾夫王朝被推翻之後，暴力的運用使得俄國的國家與社會一如十七世紀初般的混亂無序。作者認為歷史發展的兩個主要媒介是群眾與權力，它們的存在是透過暴力的演變而來。革命可以視為對暴力潛伏形式的狂野反應。革命的混亂等於揭開了人類野蠻的本質，這個本質原是躲藏在權力的文明外衣之下。布達可夫不同於過去革命史的詮釋是，該書主要敘述的是由下而起的群眾暴力史。作者從社會和心理學角度來看革命，這與過去研究革命的著作特別強調黨與意識形態的政治角度，截然不同。從暴力的角度來看，一次大戰對俄國革命的發展影響至鉅。戰爭將暴力神聖化，卻又降低國家權威。而暴力主要源自農村悠久的傳統，而不是直接來自戰場的殺戮（一次大戰的俄國士兵主要來自農村）。對作者而言，群眾意識中的暴力是革命的先驅。二月革命既不自由也不民主，這和馬克斯史學或自由派史學觀點剛好相反。二月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是暴力革命，它使得暴力成爲一種超越的價值，將恐怖變成清洗政治的神聖力量；結果二月革命成爲操縱群眾者——將社會心理組織成紅色恐怖者的勝利。1917 年最激進的勢力在民間組織，不在黨派。十月革命以後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變成從群眾暴力過渡到國家暴力的橋樑。從這個意義來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不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而是群眾暴動史。作者認為共產主義不符合人性，革命都是暴力。即使有人批評該書主要以二手研究爲主，所用的檔案資料不多；或認爲作者過度反共。但這些都無損於該書的重要性，它仍是近幾年來研究十月革命必讀之作。

波塔索夫和布達可夫的力作，說明了群眾力量的重要，不管是以民主或暴力的形式出現。群眾之中，若再以階級來劃分，那麼與革命關係最密切的就是無產階級。過去蘇聯官方史學一談到革命就必須強調工人階級的重要角色。在 1991 年之後已有學者研究布爾什維克黨在工人階級的影響力並非如過去蘇聯官方宣傳的那樣強大。<sup>24</sup>而且研究工人與革命的關係著作大爲減少，有之也是將重點放在工人自己的組織和心理，而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成就或工人的「革命先鋒」

<sup>23</sup> Владимир Булдаков, *Красная смута: Природа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шo насилия*(紅色的混亂：革命暴力的本質及其後果)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7)。

<sup>24</sup> Дмитрий О. Чураков,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рабоче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1917* (俄國革命與工人自治, 1917) (Москва: АИРО-XX, 1998)轉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 2, сс. 194-196;反駁工人自治組織受到革命黨宣傳的影響。這些組織的出現是由工人爲維護其自身利益而成立的。



角色。<sup>25</sup>

至於十月革命與內戰的研究，有學者將內戰的開端追溯到 1917 年 2 月，意圖為布爾什維克黨開脫罪名。也有白軍擁護者以「黨史」的模式撰寫歷史，白軍在他們筆下彷彿成了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民主或愛國美德的人們。比較能夠從多方面的角度，持平評價白黨的是史莫林(A. В. Смолин)的 *Бел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 Северо- Западе России, 1918-1920 гг.* (在俄國西北的白色運動，1918-1920)。他認為白色運動並不是可以取代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另一選項。它的目標受到許多利益和勢力的牽制；它的失敗始自內部和社會因素，而以地緣政治告終。<sup>26</sup>再者，內戰研究的另一特色是，若干住在莫斯科與彼得堡以外的學者利用地方檔案寫出的紮實著作。其中最獨特的是那爾斯基(И. В. Нарский)的專著。<sup>27</sup>他寫烏拉爾區小市民眼中的革命與內戰。這是第一本有關十月革命到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日常生活史，十分引人入勝。這樣的取材亦可見年輕的俄國學者已開始逐漸與西方學界接軌，不再只將注意力放在國家與政黨，而是關心小市民的生活。

整體而言，政治史雖然仍是俄國學者研究的焦點之一，但已不像過去那樣僅僅侷限在上層政治或黨派，政治勢力與社會力量的互動也是重點。社會史也逐漸增多，日常生活史也開始出現。俄國學者同時也忙於介紹和吸收西方研究十月革命的成果。<sup>28</sup>但是十月革命與非俄羅斯民族的研究，仍付諸闕如。相較之下，西方學界近年來對革命與民族問題的研究則頗有收穫。<sup>29</sup>至今也沒人研究婦女與革命的關係。目前利用文化研究所重視的符號意義撰寫的成果，也代表年輕一輩俄國學者與西方學界合作的佳例。例如，利用 1917 年所用的語言與象徵符號來解釋俄國革命，研究在政治鬥爭中，各方勢力如何利用語言和旗幟、徽章、大眾儀式、歌曲、衣著規定等創造意義和尋求認同。<sup>30</sup>

## (二) 史達林的統治時期 (1929-1953)

蘇聯解體之後，史家試圖重新評價史達林及其統治。過去被視為禁忌的問題

<sup>25</sup> И. А. Прохоренко, *Рабоче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1917-1926 г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Сама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工人自治在俄國：根據薩馬拉省的資料)(Самара, 1998); Сергей В. Яров, *Пролетарии как полити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рабочих Петрограда в 1917-1923 гг.* (作為政治活動者的普羅階級：彼得格勒工人自治的政治心理，1917-1926) (Ст. Петербург: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9) 轉引自 V. P. Buldakov, "Scholarly Passions around the Myth of 'Great October': Results of the Past Decade" *Kritika*, Spring 2001, 2(2): 299.

<sup>26</sup> V. P. Buldakov, "Scholarly Passions around the Myth of 'Great October': Results of the Past Decade" *Kritika*, Spring 2001, 2(2): 303-304.

<sup>27</sup> И. В. Нарский, *Жизнь в катастрофе: Будни населения Урала в 1917-1922 гг.* (災難性的生活：烏拉爾山的日常生活，1917-1922)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sup>28</sup> П. В. Волобуев & В. П. Булдаков,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к изучению" (十月革命：新的研究角度)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 5-6, сс 28-38

<sup>29</sup> Mark von Hagen, "The Great War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thnicity," *Post-Soviet Political Order: conflict and State Building*, ed. Barnett R. Rubin & Jack L. Sny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eter Holquist, *Making War, Forging Revolution: Political Practices in the Don Territory During Russia's Deluge, 1914-192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up>30</sup>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New York: Penguin, 1997); Figes & Boris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如史達林統治的黑暗面，農業集體化後的農民，強制性的種族遷移，集中營制度等，都是研究熱點。上層領導與決策固然也是焦點之一，數量較多又爭議不休的則是史達林整肅的受害人數。此外，由於內務部秘密警察檔案的逐漸公開，社會史與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開始蓬勃發展。

老一輩的俄國學者如沃洛布也夫(Павел В. Волобуев)<sup>31</sup>、丹尼洛夫、麥德維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等，即使在蘇聯時期批判過史達林，也只是說史達林所推行的政策不是根源於列寧主義的精神，但沒有質疑過列寧主義或共產主義。例如，沃洛布也夫就認為史達林主義不是直接來自十月革命，而是革命政權變質與退化的結果。這種情形與法國大革命之後熱月反動十分相似。<sup>32</sup>但是在青壯年輩的學者之中，則不乏從根本來否定共產主義的制度及其理想者。他們對於史達林政權的評價往往是完全負面；他們認為史達林透過政治局、集中營等所展現的權力，造成了極權統治。

近年來大量利用蘇共政治局與內務部秘密警察的檔案，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年輕學者當屬赫列夫紐克(Олег В. Хлевнюк)。赫列夫紐克由於工作職位的關係，有機會看到多數學者無緣得見的蘇共高層檔案。他不但編輯史料，<sup>33</sup>而且利用這些資料，寫出數本受到學界高度評價的專書，提出許多不同於以往的新詮釋。赫列夫紐克的第一本重要專著是 *1937-й: Сталин, НКВД и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1937年：史達林，內務部與蘇聯社會)。內容主要是追究史達林恐怖政治的責任。作者認為任何說詞都無法為史達林的罪行辯護。史達林是恐怖政治的啟動者；他一步步地策劃誅除異己，內務部的秘密警察配合他的決策。當時絕大多數老百姓保持緘默，不是因為他們相信史達林的說詞，而是因為畏懼，所以沒有明言反對。<sup>34</sup>其後，赫列夫紐克將第一本書中的一小節抽出擴充成書，詳細地闡析史達林與重工業部長奧爾忠尼啓澤(Г. К.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在1930年代的衝突。作者認為奧爾忠尼啓澤屬於政治局的溫和派，溫和派的力量多少減緩了史達林極端的政策與恐怖主義所造成的後果。奧爾忠尼啓澤與史達林是喬治亞同鄉、革命戰友。兩人早期私交甚篤，後來由於史達林的整肅政策，他的親信與兄弟相

<sup>31</sup> 國家科學院院士，布里茲涅夫時期，曾任歷史研究所所長，是研究十月革命的權威。

<sup>32</sup> P. V. Volobuev, "Perestroika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Soviet Historiography" *Russian Review*, vol. 15, Oct. 1992, p. 576.

<sup>33</sup> 赫列夫紐克在1987年拿到歷史學位之後，即加入 *Коммунист* (共產黨人) 編輯群——蘇共的機關雜誌，1991以後改名為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自由思想)，現任職於俄羅斯國家檔案館。他參與編輯的檔案選有：*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е годы* (1930年代史達林的政治局) (Москва: 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 1995); *Письма И. В. Сталина В. М. Молотову 1925-1936 гг.* (史達林給莫洛托夫的信) (Москва: 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 1995。此書同時出版英譯本：*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Сталин и Каганович: Переписка 1931-1936* (史達林與卡岡諾維奇的通信，1931-1936)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и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945-1953* (蘇共中央政治局與蘇聯部長會議，1945-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Письма во власть. 1928-1939: Заявления, жалобы, доносы, письм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и советским вождям* (給當權者的信，1928-1939：聲明，申訴書，密告信，給政府官員與蘇聯領袖的信)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sup>34</sup> Олег В. Хлевнюк, *1937-й: Сталин, НКВД и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1937年：史達林，內務部和蘇聯社會)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2)

繼被捕，因此與史達林發生嚴重衝突，終至身亡。作者認為奧爾忠尼啓澤的死對於當時的溫和派是一大打擊。<sup>35</sup>雖然作者運用大量檔案質疑坊間出版的回憶錄說詞，卻也無法回答許多關鍵問題，例如，奧爾忠尼啓澤的死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由此亦可看出檔案的侷限。不過，該書也讓我們對政治局的組織與運作，特別是高層領導之間的互動有更深入的了解。延續第二本書的議題，加上對政治局資料堅實地掌握，赫列夫紐克又寫了一本關於 1930 年代政治局機制的書。書中指出，由於從上而下的快速工業化與強制集體化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史達林及政治局其他成員爲了保存極權主義制度，不得不做些讓步。這使得政治局在行政、經濟與社會的政策常常在嚴酷與較爲節制的措施之間擺盪。例如，1932-1933 年強迫集體化引起農民群起反抗，導致政府採取嚴峻的鎮壓與恐怖措施。1934 年之後，政府又有所節制，到了 1937 年又開始鎮壓。作者認為政治局內的溫和與激進兩派，其成員互有流動，兩派成員並非一成不變，端視議題而定（作者沒有說明這樣的流動性有多高？如果很高，還能叫派別嗎？），史達林會鼓勵和操縱兩派之間的競爭。他雖掌握最後決定權，但也不是有絕對的自由選擇權。他必須還要考慮當時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各部門本位主義的矛盾，高層幹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的立場等。不過這些並非作者在書中所要討論的重點，他最終想要強調的還是政治局及其成員在決策時所扮演的角色。<sup>36</sup>總結赫列夫紐克這三本書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史達林主義的基本特徵是恐怖統治。

造成史達林恐怖統治的主要政策之一是農業集體化。數位俄國學者利用地方檔案，深刻且詳盡地描述無數農民因爲這個政策而被流放後的悲苦命運。史達林意欲完全剷除「富農」這個階級，結果造成許多所謂「富農」的財產被沒收，大量農村人口的流離失所，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或被遷移到特別區。他們運用各種方式反抗，在當地落戶後的社會地位十分卑微，史達林的經濟制度嚴厲的剝削他們的勞力，使其過著有如農奴般的生活。這些學者均對當權者譴責有加。<sup>37</sup>

此外，關於集中營的勞動力在蘇聯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過去揣測頗多。但是一直要到蘇聯解體，內務部秘密警察等檔案開放之後，加上集中營的文學、口述訪問、回憶錄的出版很多，方才出現較爲清楚的輪廓與數字。第一本以集中營歷史爲題而出現的嚴謹學術著作是衣凡諾娃(Galina M. Ivanova)的書。她

<sup>35</sup> Олег В. Хлевнюк, *Сталин и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е годы* (史達林與奧爾忠尼啓澤：1930 年代政治局裡的衝突) (Москва: АИРО-XX, 1993)。

<sup>36</sup> Олег В. Хлевнюк,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1930-е годы* (政治局：1930 年代政治權力的機制)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6)。利用 1930 年代蘇共高級領導的個人檔案與政治局開會記錄（甚至包括政治局的一些速記錄原稿）而寫成。附錄列有 1930 年代政治局成員名單、開會數量、處理事件數量、政治局成員拜訪史達林的數字統計。

<sup>37</sup> Т. И. Славко, *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цы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1933-1938* (西伯利亞西部的特殊移民，1933-1938)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4), *Кулацкая ссылка на Урале, 1930-1936* (富農放逐在烏拉爾，1930-1936) (Москва: Мосгорархив, 1996); В. Я. Шашков,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в СССР и судьба 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цев 1930-1954 гг* (蘇聯的去富農化與特殊移民的命運，1930-1954) (Муманск, 1996) 轉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 5, сс.195-198; С. 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Серп и молот: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ссылка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в 1930-е годы* (鐮刀與屠殺：西伯利亞西部的農民放逐，1930 年代)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利用大量官方檔案，濃縮地敘述集中營制度的起源、形成、功能，試圖較為全面地呈現集中營制度的圖像。有別於西方學界對集中營的研究多聚焦在 1930 年代後期的大整肅，該書所涵蓋時間則從 1920 年代到 1950 年代。作者認為集中營形成了國中之國，它有自己的法律、習慣、道德標準、社會群體等。這個制度/殖民地主要以暴力為手段來達到目的。這樣的現象雖然大量地出現在史達林時期，而其源頭可以追溯到沙皇時代的專制與威權主義，此乃是罔顧人權與自由所致。史達林式的集中營始自 1920 年代末的國家政策與農民為敵，其目的不但在於控制社會，也有利用廉價勞力的經濟動機。作者認為極權政權是由許多層面的人民參與其中的罪行所造成；常常很難分清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兩者之間的關係十分錯綜複雜。作者不認同僅僅是爲了要建立一永久且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必須以人權為代價而建立古拉格制度。她將古拉格制度的起源歸咎於一些特殊事件：利用強制勞動力的需要遽增，內戰的嚴峻措施，強迫性的工業化與集體化。蘇聯從內戰以來即用罪犯從事生產，到 1930 年代初古拉格的勞力成爲蘇聯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但是集中營制度對蘇聯經濟與自然環境有害。<sup>38</sup>這本書的內容對於熟悉西方學界對蘇聯史研究的讀者而言，可能會了無新意。但是對於俄國學界與一般讀者而言，即使不是石破天驚，也是有極強震撼力的著作。

相較於前後（即十月革命與冷戰）時期，史達林時期的社會史研究，成果最爲豐碩。社會史之所以受重視，「老百姓的聲音再現」之所以可能，倒不完全因爲是跟著西方學術潮流走之故。這與秘密警察檔案的開放，可以公開過去批評政府的種種言論，關係密切。俄國科學院俄國史研究所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特別籌畫出版一系列的社會史研究成果。以下所提的數本專著，均出於該系列叢書。這也顯示俄國學者在研究蘇聯史的一個新方向，迥異於過去學者僅將研究焦點放在黨國政策或權力鬥爭的政治史，更豐富了我們對史達林時期人民生活與社會的瞭解。例如，飢荒問題在蘇聯時期是完全不能碰觸的題材（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怎麼可能會有飢荒！）。紀馬（В. Ф. Зима）的力作卻揭開了二次大戰之後嚴重飢荒的神秘面紗。作者認為二戰之後的蘇聯成爲貧窮的超級強國。政府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原子彈計畫、重工業、維持在東歐所需經費等，罔顧民生計。蘇聯發生飢荒時，農村受害最深，因爲他們沒有工人在工廠所享有的福利制度；結果造成農村人口移居城市。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仍對發生飢荒的農村採取徵收穀物的政策。其目的有二：1) 爲了糧食輸出到法國和東歐各國等，俾能支撐蘇聯在歐洲的政治地位；2) 預留穀物，以防軍事緊急情況又起之時。不幸的是，這些從農村強制徵收而來的糧食，因爲儲藏不當而腐爛，徒然造成浪費。書中最重要的是處理飢荒對社會的影響。作者認為飢荒變成無法避免，主要是因爲政府重視意識形態更甚於人民。該書是目前關於戰後蘇聯農村最詳盡的研究。作者利用新的檔案材料，將飢荒的原因、規模與範圍、悲慘的災難，敘述詳盡。跟據作者估

<sup>38</sup> Галина М. Иванова, *ГУЛАГ в системе тоталита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在極權國家制度中的古拉格集中營)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1997)。英譯本 *Labor Camp Socialism: the Gulag in the Soviet Totalitarian System* (NY: M. E. Sharpe, 2000)

計，死於飢荒的人數（包括病死）約有 200 萬人。作者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飢荒必然會不斷地發生。因為蘇聯這個國家侵略成性，在外交孤立的情況下，被迫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與儲存大量的戰備糧食，以備不時之需。飢荒發生時，蘇聯領導早已算計好配額糧食，設定好政治目標與鎮壓人民。<sup>39</sup>這樣的論點自然會遭受保守派學者的批評。伏爾可夫(И. М. Волков)即認為 1946 年的旱災是二十世紀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即使政府動員所有儲備的糧食，也無法滿足饑民的需要。他認為研究戰後飢荒的學者，忽略了一個事實：戰後七年政府對集體農莊的協助十分有限，農民卻能克服最艱困的環境，而在 1952 年農產量提升到戰前水準，但紀馬對此巨大成就卻隻字不提。<sup>40</sup>伏爾可夫的辯解其實更說明了政府完全不管農民死活，農民只能自力救濟。

除了對農村問題的重視，蘇聯工業化如何影響人民生活，亦成為社會史研究重點。歐薩琦娜(Елена Осокина)的書扮演了開路先鋒的角色。她認為中央集權化的分配制度的特色是階層化、特權與腐敗。1931 至 1935 年的配額制度是全世界最階層分化的制度，比二次大戰期間還糟。政府不惜代價地實行現代化政策，卻造成糧食短缺（此乃不當的農業政策所致）時，優先受到照顧的群體是那些任職於關鍵工業的工作人員。作者認為即使沒有蘇聯對芬蘭戰爭的發生，還是會有因糧食短缺而出現配額的情形，這是施行史達林式經濟政策必然會發生的副產品。政府的特權制度剝奪了人民正常的物資供應和中央分配與市場的共生關係。書中亦論及合法與非法的私人買賣。新經濟政策結束之後，私有買賣仍是人民收入與貨品的主要來源。<sup>41</sup>

另外，從注意人民生活到重視人民意見，是社會史研究重要的一環。過去在蘇聯共產黨極度威權的統治之下，政府向來不受重視人民的意見。學界縱使對此議題感興趣，也無足夠的資料可供研究。而在蘇聯解體之後，對於民間看法的研究開始成爲一個方興未艾的課題。聖彼得堡有位學者利用當地檔案館裡的區域性匯報(сводки)、請願書、書信、譴責信寫成的專著，反映出工農與知識份子在 1927 至 1935 年對國家政策與生活狀況的印象。作者亦知使用匯報的限制：不僅對匯報是在何種情況下寫成所知甚少，匯報中的文法與文風的不連貫可能是種警告，亦即有些半文盲的線民不一定有能力將他們所偷聽到的消息準確地寫在紙上。作者泛論在同質性高的列寧格勒區的民族間衝突則有代表性不足之嫌。<sup>42</sup>

<sup>39</sup> В. Ф. Зима,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46-1947 годо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1946-1947 的蘇聯飢荒：源起及結果)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РАН, 1996)

<sup>40</sup> "Деревня СССР в 1945-1953 годах в новейш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историков (конец 1980-х – 1990-е годы)" (歷史學者對蘇聯農村(1945-1953)的最新研究)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6, с.116, 121.

<sup>41</sup> Елена Осокина, *За фасадом.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изобилия"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и рынок в снабжени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годы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1927-1941* (「史達林式富裕」的幕後：工業化時期的配給制度與市場，1927-1941)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9)。

<sup>42</sup> Сергей А. Шинкарчук,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Северо-запада)* (1930 年代的蘇聯輿論——根據西北地區的材料)(Ст. 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т.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экономики и финансов, 1995)。轉引自 David Brandenberger, *Russian Review*, 58:2。

研究民間觀點最受人矚目與好評的是茹勃可娃（Елена Зубкова）。學界之所以十分重視茹勃可娃的著作，原因之一是她是第一位俄國學者對戰後史達林時期的社會，著墨最多的研究，並且是由下而上來探討國家與社會關係。她的 *Russia After the War: Hopes, Illusions, and Disappointments, 1945-1957* 主要談二次大戰之後，老百姓覺得衛國有功，希望政府有所回饋。他們期待政府能在戰後一改過去嚴酷的政策，給予社會比較開放的環境，重視民生工業的發展，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人民對此期望之殷切，有如回到 1815 年的俄國。在農奴勇敢堅毅地擊敗入侵的拿破崙大軍之後，盼望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因此能夠賜予他們人身的自由。結果農奴並未在戰後立即獲得解放，就像二次大戰之後，國家不但對社會的控制沒有鬆懈，反而出現第二波的整肅，加上復員軍人的安置問題與 1946-1947 年的飢荒，人民的希望因而幻滅。他們渴望已久的和平並未使生活獲得任何改善，日子過得與戰時沒什麼兩樣。1953 年 3 月史達林的過世，又重新在許多人的心目中燃起希望。赫魯雪夫的政策確實大大改善人民的生活（在他任內所建的房舍總量約等於史達林時期的總數），政治控制也不似過去嚴厲，也平反了許多人，因而有所謂的解凍之說。但是在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又造成政策的緊縮與人民的失望。這本英文書是茹勃可娃改寫自數年前她在莫斯科出版的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ормы, 1945-1964*（社會與改革）一書，但時間僅及於 1957 年，而不是俄文版的 1964 年（赫魯雪夫執政結束那年）。<sup>43</sup>2000 年，她又以俄文出版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1945-1953*（戰後蘇聯社會：政治與日常生活）。<sup>44</sup>事實上該書是將英文本結構再行重組，時間則只到史達林逝世為止，基本論點與英文本並無軒輊。不過，她將書中原有兩三頁篇幅的若干部分（如人民犯罪、蘇聯式的民主、人民對國際局勢的看法等問題）擴充成節，使得內容變得更為細緻，並引用更多檔案資料與統計數字，成為一本引人入勝，瞭解當時蘇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好書。該書比較有爭議的是，作者將人民在公開場合大聲表達自己而不怕被孤立的看法，視為輿論。但是作者引用的材料有許多來自日記、口述訪問、回憶錄、百姓寫給蘇共中央或雜誌的信等。其中所表達的觀點可以像英文本翻譯那樣，稱之為 public opinion（輿論）嗎？或者說，是否俄文的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直譯成社會觀點(societal opinion)或人民的看法更為合適？很明顯地，作者在修訂擴充的俄文本中，其論點頗受 Sarah Davies 的影響。Davies 書中的材料與茹勃可娃所引用的十分類似，但 Davies 使用的辭彙是 popular opinion，而不是 public opinion。<sup>45</sup>畢竟輿論還包含別的意思。不過，茹勃可娃可能也是第一個俄國學者利用謠言與臆測來研究歷史。而且她特別提出即使在獨裁國家，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完完全全被官方的宣傳牽著鼻子走。

<sup>43</sup> Elena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Hopes, Illusions, and Disappointments, 1945-1957*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Елена Зубкова,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ормы, 1945-1964* (社會與改革) (Москва: 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 1993)

<sup>44</sup> Елена Зубкова,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1945-1953* (戰後的蘇聯社會：政治與日常生活)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sup>45</sup> Sarah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Terror, Propaganda and Dissent, 1934-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這樣的論點也等於是反駁了極權主義的理論。

綜而觀之，俄國學者在 1991 年後對史達林統治的書寫，最常用的一個名詞是極權主義政權。其中恐怕只有茹勃可娃有意識地指出極權主義理論的限制。這與西方史學界對同一時期的研究，呈現出有趣的對照。西方在 1960 年代之前，關於史達林時期的研究主要是政治學者的天下，運用的就是極權主義理論。到了 1960-1970 年代出現修正極權主義的社會史研究。表示史達林政權不乏人民的支持，而非完全由上而下的統治。1990 年代則主要是新文化史的天。年輕一輩的俄國學者與西方學者的交流與合作更多。他們認為許多蘇聯人民是史達林主義的參與者，而不是受害者。<sup>46</sup>

### (三) 冷戰時期 (1945-1991)

這段分期與前一期在史達林掌政時間略有重疊之處；但前面的戰後史達林時期研究以內政為主，這裡則以外交為主。<sup>47</sup>整體而言，冷戰時期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是國際關係史。冷戰時期的政治史以檔案出版品為多，外交史則是與西方出版社或學者合作為多。冷戰結束前，絕大多數檔案沒有開放，難以作實證研究，西方學者往往只能援引比較進步國家的模式與理論，詮釋蘇聯在冷戰時期種種的政治現象與歷史發展。1991 之後，俄國政府財政困難，各檔案館難以維繼，遂有各種與西方學術機構合作的計畫。其中最成功與持久的佳例是華盛頓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成立的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這個當今冷戰研究重鎮主要以政治外交為焦點，專門蒐集、翻譯與出版前共產國家的解密檔案。並且不定期出版冷戰研究公報與專刊。<sup>48</sup>吉汴恩斯基(Леонид Гибянский)和祖伯克(Владимир Зубок)即是常在其出版品發表論文的俄國學者，而且後來相繼出版關於蘇聯與西方和東歐關係的紮實專著。

除了戰後史達林的外交與國際關係是一研究熱點之外，過去完全受忽視的赫魯雪夫時期，終於漸漸得到應有的重視。研究赫魯雪夫時代的專著，在蘇聯時期只有一本傳記，但著重於他的政治生涯及其在國際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sup>49</sup>事實上，赫魯雪夫不但在冷戰時期，扮演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重要人物，在內政方面，特別是改善人民生活上，亦頗有建樹。他上台之後十分關心農業問題，並將政策重點由重工業轉向農業與民生工業。但是截至蘇聯解體前，所有他任內的農業政策，在俄文史書中只有官方政令與統計數字，談不上是研究，更遑論深入探討了。可喜的是，1991 之後，俄國學者在這方面沒有交白卷。韋爾碧茨卡雅(O. M. Вербицкая)的研究指出 1946-1960 年蘇聯農民生活改善很多，特別是赫魯雪夫時

<sup>46</sup> Sheila Fitzpatrick ed., "Introduction," *Stalinism: New Directions* (London & NY: Routledge, 2000) pp.1-14.

<sup>47</sup> 史達林在冷戰外交史所扮演的角色詳見 Norman M. Naimark, "Cold War Studies and New Archival Materials on Stalin" *Russian Review*, 61 (Jan. 2002) : 1-15.

<sup>48</sup> 詳見其網站 <http://cwihip.si.edu>

<sup>49</sup> Рой А. Медведев, *Н. С. Хруще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赫魯雪夫：政治傳記) (Москва: Книга, 1990).

代。<sup>50</sup>詹達恩諾娃(Л. В. Занданова)則利用中央與地方檔案，著眼於人民響應政府號召的墾荒運動，以遷徙到西伯利亞的農民為例，詳細敘述其始末以及所遭遇的困難和成就等。從二十世紀初史托里賓的農業改革開始，政府即常有懲罰性的將農民遷移到烏拉爾的「特別移民區」(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ие)。二次大戰之後，蘇聯開始有計畫的，以志願的方式，鼓勵農業移民：將缺乏耕地與勞力過剩的歐俄農民遷往勞力不足的西伯利亞，以解決經濟與人口問題。結果將西伯利亞的許多集體農場改為國營農場。國營農場的經營模式較好，最初三、四年收穫不錯，但後來因為土地過度使用，加上風與水的侵蝕，收成漸差。結果到西伯利亞的移民，逐漸喪失農民本業與身份，而成為城市居民(學生、青年、復員軍人)。作者對負面發展描述過少。例如移民抱怨住房不夠，沒有區分私人與公家牲畜，主管經濟人員的冷淡地漠視移民者的權益等。<sup>51</sup>

澤勒寧(И. Е. Зеленин)則撰寫專書探討赫魯雪夫的農業政策。他認為赫魯雪夫的農業改革充滿矛盾。赫魯雪夫相信堅強的意志可以在短期內大大改善某些複雜的情況，不需要全面改造農業。不過，由於他的農業改革倉促實施，又沒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反而因此抵銷了其改革初意所欲達到的理想與目的，這是造成赫魯雪夫農業政策失敗的主因之一。加上赫魯雪夫迷信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並讚揚農業生產的「大躍進」觀念等等，造成農業改革失敗勢所難免。他的農業改革不是相信科學，而是相信理念與直覺。作者的結論是，赫魯雪夫的農業改革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的框架下，想要現代化的嘗試，在當時環境之下，別無其他選擇。<sup>52</sup>

將赫魯雪夫執政時期視為俄國史發展過程中重要改革階段的是列以柏維奇(О. Лейбович)。他將書名直接冠以現代化之名。這是筆者目前所見，第一本直接以現代化為名的蘇聯史研究。作者雖然也知道現代化理論不足之處：它就像所有的社會學理論一樣，企圖得到普世性，找到歷史過程中最常見的趨勢，而沒照顧到歷史過程的多面性與深度。不過，作者仍決定用現代化理論來解釋的原因是，1)現代化理論可以解釋俄國兩百年來歷史發展的延續性；說明俄國如何從傳統社會加速邁向工業社會的過程，而不是一段「空洞」(пустота)、「崩解」(провал)、或「歷史枷鎖的斷裂」過程。2)這樣的角度可使史學者將注意力放在俄國與其他歐亞世界共同的歷史命運，將與資本主義競爭、積極地引進西方技術等作為衡量成敗的標準。3)現代化理論的觀念可以指出俄國歷史過程的特殊性：執政當局總想在保存國家民族認同的同時，又能克服落後於西方最先進國家

<sup>50</sup> О. М. Вербицкая,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От Сталина к Хрущеву. Середина 40-х — начало 60-х годов* (俄羅斯農民：從史達林到赫魯雪夫，1940年代中期—1960年代初期)(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2) 轉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 2, сс.207-213.

<sup>51</sup> Л. В. Занданова, *Переселени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ую Россию (конец 40-х—середина 60-х гг. XX века)* (亞俄地區農民的遷徙，1940年代末期—1960年代中期)(Иркутск: Изд-во Иркутского гос. Пед.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7) 轉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 3, сс.194-196.

<sup>52</sup> И. Е. Зеленин, *Агр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Н. С. Хрущева и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赫魯雪夫的農業政策與農業)(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1), 轉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3, № 1, сс.190-191.



的因素。作者雖然以現代化理論架構來看史達林死後的改革，但行文敘事，除了談論上層政策，也沒有忽視下層老百姓，甚至是社會底層人民在現代化過程中所作的貢獻與犧牲，以及他們對政府政策的看法。<sup>53</sup>

另一以現代化理論詮釋蘇聯內政的是科茲洛夫（Владимир Козлов）關於群眾暴亂的書。該書主旨乃是敘述造成工人罷工、種族衝突、士兵、東正教信徒等暴動發生的原因及後果。這些抗議行動與衝突的頂峰出現在 1960 年代初期。作者認為赫魯雪夫揭露了史達林並非無所不能的面紗，去除了他的神格，卻保留史達林的「現在與未來都是光明的共產主義」的浪漫夢想，是引起大眾騷亂的主因。過去俄國學者研究蘇聯時期的反抗活動都是集中在內戰時期的反蘇維埃叛亂或是史達林時期的反對集體化的農民暴動。科茲洛夫的專著則是第一本以城市和種族暴動為主，比較全面地討論各種動亂案例的書。史達林的嚴酷與強迫性的現代化與赫魯雪夫猶豫不決的改革，使得人民將積怨已久的情緒，透過群眾暴亂的方式大量地爆發於各地。科茲洛夫視這些暴動為現代化危機的一部份，卻又是穩定的信號，對社會有正面的影響。因為在非民主國家，沒有合法管道可以宣洩人民的不滿，暴動意味著人民越過官僚體系，直接向高層傳遞衝突存在的信號，企圖將「真相」讓莫斯科的領導知道，也會迫使政府調整政策。人民暴亂的原因不是要推翻蘇維埃政權。他們仍相信共產主義最初的理想，但是由於地方官員的腐敗及不當措施造成他們生活困苦。這種心態頗類似於帝俄時代的農民叛亂，農民仍相信有個「好沙皇」的存在，他們所憎惡的只是地方官員的腐敗與不當措施。到了布里茲涅夫時代暴亂減少，乃是因為人民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幻滅與懷疑，他們不願再冒著生命危險為這理想奮鬥。結果反而為社會的相對穩定付出昂貴的代價，蘇聯社會逐漸走向崩解，使得戈巴契夫的改革更為困難，最後導致蘇聯解體。

54

最後，涵蓋整段冷戰史的重要著作是皮禾亞（Р. Г. Пихоя）的書。作者在 1990-1996 曾擔任全俄羅斯檔案館（Росархив）的最高主管，因為職位之便，能夠看到絕大多數學者無緣得見的上層政治檔案（包括總統檔案）。該書以檔案為基礎，冷戰後期則特別倚重回憶錄。書的主軸是政治史，經濟社會方面寫得很少，且不夠準確。他將焦點放在蘇聯領導人、他們之間的關係、行動與辯論、權力及其日常運作上。他的書名副標題為「權力的歷史」乃是對於他一直在思索歷史到底是為什麼、如何、被誰製造出來等問題的答案。皮禾亞看待二次大戰之後到蘇聯解體的過程是一部權力的歷史（令人困惑的是，難道 1945 年以前的蘇聯史與權力無關？）本書的價值在於豐富的細節。例如，他揭發赫魯雪夫關於貝利亞改革不實的指控。官方公佈的蘇共二十大的演講內容是開會次週所寫與編輯的，與赫

<sup>53</sup> О. Лейбович, *Реформа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1953-1964 гг.* (改革與現代化, 1953-1964) (Пермь: Перм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3).

<sup>54</sup> В. А. Козлов,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еве (1953-начало 1980-х гг.)* (赫魯雪夫與布里茲涅夫時期的蘇聯群眾騷動, 1953 初-1980 年代)(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1999). 英譯本 *Mass Uprisings in the USSR: Protest and Rebellion in the post-Stalin Years*, (M. E. Sharpe, 2002)